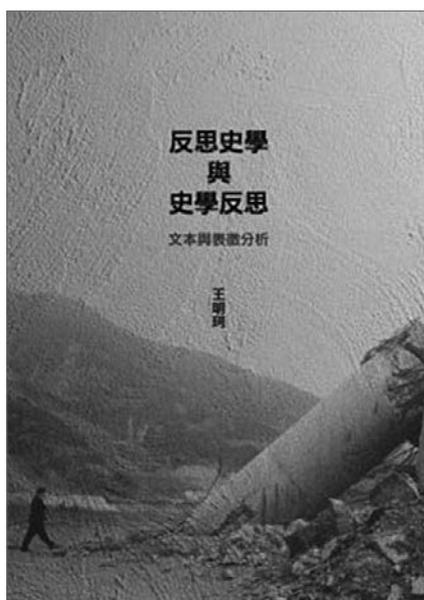


當歷史成為「歷史」

——評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

●王 柯

《反思》不僅強調「眼」是歷史的產物，更通過對「歷史」和人類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建構的循環規律和方式的剖析，證明了這隻「眼」同時還是「歷史」的製造者，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指出了「歷史」的價值和實現其價值的具體途徑。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關於歷史人類學學者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以下簡稱《反思》，引用只註

頁碼）一書^①所提出的「反思史學」思想的意義，我們或可從再次咀嚼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以下這句名言中的哲理開始：「『眼』是通過教育而再生產的歷史產物。」（The “eye” is a product of history reproduced by education.）^②對於「史學反思」的提倡，反映出作者對當今中國歷史學研究現狀的三重擔憂：不分歷史（真實發生的過去）與「歷史」（人們對歷史的記憶與表達）、不知「歷史」之價值以及缺乏處理「歷史」之手法。也就是說，對於王明珂來說，從「史學反思」到「反思史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所以，《反思》不僅強調「眼」是歷史的產物，更通過對「歷史」和人類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建構的循環規律和方式的剖析，證明了這隻「眼」同時還是「歷史」的製造者，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指出了「歷史」的價值和實現其價值的具體途徑。事實上，以上思想已經陸續、零星地反映在王明珂過去各種歷史

人類學的大作之中。本書則是從理論邏輯上對以上思想進行了系統和細緻的梳理，堪稱是至今王明珂學術思想之集大成。

一 歷史成為「歷史」： 人類社會的一種必然

布迪厄的認識論中最為人稱道的內容之一，就是「對理論理性的批判」。致力於布迪厄研究的日本社會學家山本哲士曾經概括道：「簡單說來，『對理論理性的批判』，就是必須對將對象客觀化的觀察者的姿態，以及他所使用的觀察方法也同時進行檢視。哲學家一般只思考『思考』為何物，但是不去思考『思考者』的意義，這是不行的。」因為，「人們接觸各種事和物的過程，就是從某個角度和利用某種方法將對象客觀化的過程。但是，任何一種方法和觀點都產生在各種社會條件的集合約束中。同樣，將對象客觀化的觀察者本人也是由各種社會條件所決定」^③。正如盲人摸象，即使是同一個事物，因為各人的知識範圍和認識能力有所差異，反映在不同人「眼」中也會是不同的鏡像。因此，要想真正認識事物的本質，就需要有一個「對客觀化進行客觀化」的程序——檢視思考者、觀察者認識事物時使用了何種方法，即通過甚麼樣的「眼」來觀察。

布迪厄的認識論通過對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二者之間立場的相對化，說明真正客觀的觀察者其實是不存在的。「對理論理性的批判」的思維，給予傳統的社會學、人類學

和歷史學極大的衝擊。社會學家稱布迪厄的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學的社會學研究」^④，歷史學家認為布迪厄提倡「歷史學應該成為針對歷史的社會學，社會學應該成為針對今天的社會史」^⑤。而曾與布迪厄有直接交往的山本還指出：「在對主觀主義的『想像的人類學』，即一種『人類論』進行系統剖析批評時，也必須同時對用於作為剖析判斷手段的客觀主義的認識論及社會學的思想前提進行剖析批評。……這才是『對理論理性的剖析批評』。」^⑥顯然，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接觸到布迪厄關於觀察者與被觀察者、觀察者的觀點與被觀察者的觀點等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辯證法關係的哲學思考之後，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將這種思想，反映於處理作為主觀的研究者和作為客觀的研究對象之間的辯證關係的問題上。

無疑，王明珂提出「反思史學」思想的出發點，即區分歷史與「歷史」二者，同樣受到了布迪厄的認識論影響：「許多歷史學家研究的是歷史，他們宣稱自己發現了一些歷史事實，但他們所說、所寫的『過去』無論如何仍是『歷史』，也就是人們對『過去』的記憶與陳述。」（頁25）也就是說，「歷史」就是人們對過去的記憶與陳述，而歷史則是「絕對社會本相及歷史事實」（頁285），但那是人類幾乎不可能掌握的。因為「我們生活在歷史知識構成的社會現實之中（歷史學者亦如此），社會現實塑造我們對『歷史』的想像與建構」（頁49）。所以，人們能夠觀察到的一切社會現象，包括各種歷史文本中的記載，事實上都不過是一種已經被「客觀化」之

王明珂區分歷史與「歷史」二者受到布迪厄的認識論影響。人們能夠觀察到的一切社會現象，包括各種歷史文本中的記載，都不過是一種已經被「客觀化」之後，由前人「眼」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而已。

人們所認識、理解、記錄和記憶的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經過「客觀化的重層化」的改造之後而形成的「歷史」的事像。《反思》之所以反覆強調這一點，強調區分歷史與「歷史」的重要性，目的應該在於警示歷史學界對這種意識的缺失。

後，由前人「眼」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而已。

然而與其他同類著述不同，《反思》超越了「分析者的見地與分析對象者的見地」和「研究社會學的社會學研究」⑦的層次，指出了布迪厄的認識論所強調的人類在認識和思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反思性」(reflexivity)，在人類建構社會問題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把布迪厄關於觀察者與被觀察者、觀察者的觀點與被觀察者的觀點等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哲學思考，進而延伸到了解釋「歷史」與人類建構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層次：「我們生活在『歷史』造就的社會現實中，因此得到自己的社會身份認同，同時我們也在此認同下建構『歷史』，以及與他人爭論『歷史』。」(頁322)

也就是說，「客觀化的重層化」現象(即「客觀化的客觀化」不斷被重複)，並不僅僅發生在研究對象進入社會學家進行觀察的階段，而是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種事物、事件發生和發展的全過程，表現於每一個歷史階段上的每一位參加者、記錄者以及觀察者的記錄或記憶行為中。由不同的社會角色構成的人類社會，還是一個「客觀化的重層化」不斷反覆的場域。因此，所有置身於社會中的人們都既是歷史的被觀察者，又是歷史的觀察者，同時還因此成為歷史的參與者。

而由於人類的這種「歷史性」(頁162)，「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構成我們所信賴的『歷史』，而是當前的社會事實(或社會現實)使得我們選擇某些歷史事實，或創造對過去的想像，以某種方式來建構

我們所相信的『歷史』」(頁26)。最令人類信服的「典範歷史知識」尚且如此，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這樣被再認識、再理解、再記錄和再記憶，而在這樣的「客觀化的重層化」的重複當中，歷史也就必然地變為了「歷史」。

人們所認識、理解、記錄和記憶的一切社會現象，事實上都是一個個經過「客觀化的重層化」的改造之後而形成的「歷史」的事像。《反思》之所以反覆強調這一點，強調區分歷史與「歷史」的重要性，目的應該在於警示歷史學界對這種意識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豐厚的歷史學積澱。面對着浩如煙海的各種歷史文本(它們本身就是歷史被重複「客觀化的重層化」之後的結晶)，我們本來應該更加清醒：追求「絕對社會本相及歷史事實」，而不是對已經形成的「歷史」事像再進行一次加工。

二 從「社會本相」到「社會表相」

《反思》證明了歷史成為「歷史」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必然。那麼，從歷史到「歷史」的這個過程是怎樣開始和怎樣完成的呢？《反思》一書的一個重大學術貢獻，就是利用各種歷史學和人類學的資料、一環扣一環有序地演示和鋪陳出人類的本能動機如何演變為社會的集體意識的過程，從而使區別歷史與「歷史」成為可能並富有意義。

《反思》指出，人類社會都具有「四個相互聯結的、相輔相成的要素」：「環境」、「經濟生業」、「社會

結群」與「文化與其表徵」(頁64)，而環境、經濟生業和社會結群三個要素「共同構成人類生態(human ecology)」。《反思》以「資源分配」為「人類生態」誕生和發生異同的原因：環境決定經濟生業的形式，經濟生業「是造成人類領域性(human territoriality)及其相關社會形態的重要因素」(頁68)。也就是說，人類必然要遇到資源分配(通常為空間領域，書中有時稱為「空間資源」，頁163)的問題，而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和具有不同經濟生業的人們會有不同的資源分配要求。為了實現對自己有利的資源分配或者保護已經得到的分配結果，人類都會產生構建一個最理想的社會，即社會結群形式的願望。

《反思》事實上是將人類社會集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區分為由反映人類基本欲望的「社會本相」和反映人類理想的「社會表相」前後兩個階段或部分，而上述四要素則可以視為這一形成過程中的四個重要環節。人類生態就是人類的現實生存空間，所以由此而來的「無論是族群認同或其他社會群體認同，無論是人類生態情境或其中的人類社會結群情境，都是社會本相」(頁166)。換句話說，社會本相即人類生態，人類生態包含圍繞着資源分配而展開的環境、經濟生業、社會結群三個環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注意到環境和經濟生業的環節，因為它們奠定了人類社會結群的物質基礎。正如《反思》指出，「人類社會的各種族群與政治組織，如部落、民族、集權帝國以及當代各種政治形態的國家，都只是

一些人們共享、分配與競爭資源的社會結群方式」(頁333)。

書中所指的「情境」(context)，應該是表示一種由於某種客觀的前後關係而能夠造成某種主觀意識或願望之形成的場域。「人類社會結群及其領域性」，「不僅與地方環境，以及人群賴以謀生的經濟生業有關，也與人類為行其經濟生業與資源分配而建構的社會政治體有關」(頁71)。「社會結群」包括區分他者與決定內部秩序兩項功能，我們既可以靜態地通過它與環境和經濟生業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可以動態地通過它與政治的關係，探討其成因和性質。但是應該注意到，由於社會結群同時還催生着「人類內在情境取向」，所以，社會結群的環節，事實上成為促使人類社會集體意識形成的過程中在「社會本相」階段的最後一道手續。無數歷史事實可以證明：對待社會結群的態度反映着人類社會對資源分配的欲望。當有人企圖實行資源再分配時，採用的手法往往是重新解釋自己所屬的社會結群的性質以形成新的認同；然而，「在人類生態與社會情境下，社會中常形成一些規範人們歷史記憶的文化結構」(頁131)。無論是想要改造或者是想要維繫既成的社會結群規模或形式，往往是從製造「文化與其表徵」入手。

而文化與其表徵，「則是與社會本相應和的社會表相」(頁65)。「文化」，事實上是一種為了維繫既成的或製造新的社會結群認同而被製造出來的「社會表相」，其中當然包括了「歷史」。從產生社會結群的願望到完成「歷史」需要經過若干

《反思》將人類社會集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區分為由反映人類基本欲望的「社會本相」和反映人類理想的「社會表相」前後兩個階段或部分，而「環境」、「經濟生業」、「社會結群」與「文化與其表徵」四要素則是這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手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製造各種各樣的「記憶」。但是，「無論是社會記憶或其中的歷史記憶、根基歷史記憶等等，無論是口述的或書寫的文本，都是社會表徵或表相」（頁166）。我們注意到，《反思》提到的「社會表相」的構成要素多存在於精神的層面，包括記憶與失憶、知識的建構、人類思維方式被規範化等環節，而作為其表現形式的「文類」和「心性」等又涉及到「習性」的問題。

總而要之，《反思》注意到不同的社會都存在着一個將人類本能的動機演變為社會的集體意識的機制，而從前者到後者的過程實由社會本相和社會表相兩個階段構成，每個階段又存在着若干個環節，每個環節中又各具不同的精神元素和傳達形式。這一重大發現和理論整理，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社會誕生和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還可以幫助我們發現某個具體的社會的個性特徵，認識各種特徵的發生原因及其性質。

那麼，為甚麼人類必須通過「社會表相」來表達源於「社會本相」的訴求呢？其原因就在於所要說服的是一個具有規模的社會，所以說服的理由不能是個人的理由，而必須是一種能夠為大家所共有的「文化與其表徵」。許多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同意建構認同的方法就是製造同一性的想像，正如赫拉利（Yuval N. Harari）在《人類簡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指出^②：

不管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還是秦朝都和古羅馬的帝國，都只

是「由想像所建構的秩序」。支持它們的社會規範既不是人類自然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際的交流關係，而是他們都相信着共同的故事。

赫拉利認為：人類社會需要合作，而合作就需要一種「虛構故事」，以便讓它的成員之間具有一種共同的認同。就像四川北川羌族的知識份子會構建出一個「吃蕎麥」的民族文化傳統那樣（頁84-86），只要相信了這個故事中的「文化與其表徵」，就會認為他們具有共同的「歷史」。

三 社會記憶、偏見與「歷史」

有關「文化與其表徵」，即社會表相與社會集體意識誕生之關係的剖析，是王明珂「反思史學」思想的核心之一。《反思》一書舉出很多事例，說明人們通過想像各種故事來進行「族群認同」（頁184-85），例如通過對不同的人類經濟生態情境的描寫來區別他者（頁179），通過對他者的風俗的描寫來確認「我族邊緣」（頁189），通過對「身體」的描述來進行「人類群體認同」（頁192-93）。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社會結群的族群認同形式，在這裏通過各種社會表相被反映出來。

上述各種族群認同方式之所以最後能夠成立，都與「社會記憶」的形成過程有關。在《反思》一書具體分析社會記憶的部分中，至少有以下三點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記憶」是因為人類社會出於自己的需要而被認知製造出

為甚麼人類必須通過「社會表相」來表達源於「社會本相」的訴求呢？其原因就在於所要說服的是一個具有規模的社會，所以說服的理由不能是個人的理由，而必須是一種能夠為大家所共有的「文化與其表徵」。

來的：「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習得如何認知、記憶與回憶，也藉此接受（或選擇性接受）許多社會記憶，以形成及合理化個人的社會存在。」（頁158）也就是說，社會記憶之所以會被人提起或強調，並因此引起人們的注意，原因在於它具有對各種事像（儘管它可能是一種虛構）進行合理化的功能。

第二，「記憶」不可能是「絕對社會本相及歷史事實」。首先，記憶因社會結群的需要而產生，所以人類社會必然按照自己的需要而想像歷史，但是，「人類記憶也是社會性的，受人類社會結構、認同與個人社會處境等等之影響」（頁109）。《反思》形容這種社會的影響為一幅「社會文化心理構圖」，它「像是一面濾網，外在經驗由此濾網篩選……而成為個人記憶的一部分」（頁112-13）。因此，「記憶」必然是帶有「偏見」的產物，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書寫。

第三，人類社會的「記憶」（其中包括祖先記憶、社會記憶、集體記憶等形式以及失憶）與「社會本相」之間存在着對應的關係：「流傳的社會記憶便是一種社會表相。它與社會情境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如同社會表相與本相之間的對應關係。」（頁132）所以，通過分析記憶的內容和性質，以及人類社會為甚麼和如何製造這種記憶，就是一條發現社會本相、透過「歷史」接近歷史事實的有效途徑。《反思》關於「集體記憶」的分析，事實上已經告訴了我們應該如何通過哪些記憶的要素去接近社會現實：「集體記憶」並非真正的「集體」的創作，而是由部分主流社會製造出來，被部分人

「宣稱」為「集體記憶」，然後經過一定的社會過程變成集體的記憶。

尤其是第三點，對於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歷史研究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中國具有豐厚的歷史學積澱，但如果意識不到歷史文獻只是一種社會記憶，就是「不分歷史與『歷史』」；而看不到這些歷史文獻所反映出來的社會記憶與社會本相之間的對應關係，則是「不知『歷史』之價值」。王明珂對中國歷史研究現狀的這些擔憂並非沒有道理。

針對傳統的學術研究，布迪厄曾經指出了三種學術認知偏見，即社會性偏見、學術場域偏見和學究偏見。「反思史學」思想之所以注意到「偏見」的概念，應該是受到了布迪厄的影響。而值得注意的是，《反思》實際上把「偏見」看作是社會記憶的孿生兄弟，也就是讓歷史成為「歷史」的必然要素，並且證明了與「記憶」和「歷史」一樣，「偏見」也瀰漫於人類社會的空間與時間裏：「事實上，上述幾種認知偏見都更普遍地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出身背景，我們在此社會中的位置，以及由學術知識透過社會教育轉化而成的『常識』，都是一層層的帷幕，或腳底的皮繭，屏障着我們對世間一切人、事、物的感觸與認知。」（頁15）也就是說，與其說是「偏見」，不如說是必然。「偏見」作為社會的必然產物，《反思》認為其性質、內容、影響及再生產，與每個人的社會出身背景、社會地位，以及通過社會教育而成的「常識」有關。因此，「偏見」不僅不會成為學術研究的障礙，甚至可以成為一個獲得人類社

《反思》實際上把「偏見」看作是社會記憶的孿生兄弟，也就是讓歷史成為「歷史」的必然要素，並且證明了與「記憶」和「歷史」一樣，「偏見」也瀰漫於人類社會的空間與時間裏，與其說是「偏見」，不如說是必然。

會本相和接近歷史事實的手段。以上說明，「反思史學」思想雖然在「偏見」的概念上受到了布迪厄的影響，但是卻又在認識論的層次上發展了布迪厄的思想。

四 文本結構與社會情境

王明珂直言，他所提倡的這種「反思性研究」，雖然可能難以「獲得絕對社會本相及歷史事實」，但是這樣的觀察、分析方法卻可以讓人們「認識造成人們『偏見』的深層社會文化因素，因此讓我們能更『接近地』認識社會本相與歷史事實」（頁285）。無疑，尤其是對於一個「已成為過去」的社會而言，發現其「深層社會文化因素」會有助於更深入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而這些「深層社會文化因素」的密碼應該就埋藏在各種歷史「文本」（text）裏（頁19）。《反思》之所以作出這種判斷，是因為它發現「文本存在於情境之中」（頁178），文本和一定的情境（包括人類生態情境或其中的社會情境）之間，必然存在着某種對應的關係。所以，「社會記憶、歷史記憶或其他社會文化表徵，若能化為或被視為有結構與符號的『文本』，我們較容易對其進行社會情境（本相）分析」（頁166）。

《反思》將「文本」分為狹義的文本和廣義的文本，前者指一個文字資料，如書或文章等；而後者指「任何能被觀察、解讀的社會文化表徵」，如各種圖像、影劇、宗教儀式、社會行動、運動和事件等（頁167），「人類的社會行為（與歷史事件）亦可視為一種文本」（頁

179）。從形式來看，狹義的「文本」其實也是一種文獻，文本與文獻之區別只是在於對它採用的研究方法之不同。「文獻研究」通過梳理上下文關係、以釐清事件為目的，而「文本分析」則是通過此文獻所記述的歷史事實，看到「過去曾存在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人們的『認同』」（頁177）；或者說，「文本分析」要問的是：「甚麼樣的情境產生此歷史事件？」（頁178）

書中指出，「透過文本我們能更有系統的深入分析一個社會記憶與表徵」（頁170）。「反思史學」之所以如此重視文本的意義，應該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符號學的影響。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號學理論強調不能只看到符號的文字意義，而是要看到符號同時是一個具有自身表現形式和意義的二重的存在^②。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看到一個符號能夠向一般受眾所傳遞的直接信息，同時還必須注意一個符號究竟為甚麼會被選擇來傳遞這個信息。引用《反思》的原話就是：「在甚麼樣的社會情境下作者如此選擇文本符號、依循某種敘事法則以建構一文本，以及此文本所傳遞的表述性與默示性訊息為何，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頁171）如果注意到了這一點，就能夠看到符號使用者當時所處的社會情境，文本也因此能夠成為獲得當時社會本相的通道。在《反思》中我們也看到，它在進行分析文本的演示時就發現了大量的「符號」（頁176）。

通過這些大量的符號，文本不僅可以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事件的社會意義，還能夠發現一些「隱喻」

我們不僅要看到一個符號能夠向一般受眾所傳遞的直接信息，同時還必須注意一個符號究竟為甚麼會被選擇來傳遞這個信息。這樣就能夠看到符號使用者當時所處的社會情境，文本也因此能夠成為獲得當時社會本相的通道。

的信息(頁186),發現作者身處的「深層社會情境」(頁181),甚至還能達到發現「言外之意」的層次(頁191)。由於看到了文本埋藏着大量能夠解讀「已成為過去」的社會的密碼,而這些具有極大價值的密碼又是在實際田野調查中所無法發現的,所以《反思》提出歷史學者或社會學者、人類學者甚至「可以在歷史文獻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頁329)。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反思》在強調「文本分析」的意義時,指出一個「文獻」之所以可以成為「文本」,除了因為它包含着大量符號之外,同時還因為它具有與一定社會情境相對應的、暗示着該社會之結構特點的文法結構和敘事結構。「文本結構與社會情境結構間有密切關係」(頁329),雖然這一點在王明珂的《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⑩等著作中已經有所反映,但本書則系統地歸納了以往各書中的觀點,更加明確和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這一學術思想。毋庸置疑,發現文本之結構的存在並利用田野和文獻等各種手段對其意義進行具體和深入的探討,是王明珂的學術思想中超越前人之處,也是對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進步所做出的最大貢獻。

《反思》指出:「文本符號之選擇、安排,特別是其對文本結構的順從與背離」,反映出當事者或作者當時「在社會情境中的現實處境,與因此產生的情感、意圖與行動抉擇」(頁329)。也就是說,由於當事者所處的社會情境不同,或自己在社會情境中的位置不同,所

以人類會延續或者違逆傳統的文本結構來創作文本。關於文本結構的這一理論能夠應對古今中外所有人類社會的研究,理解了文本結構的理論構造,我們就可以透過許多表面的「歷史」事像而看到「深層社會情境」,並從中發現人類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共同規律。

《反思》一書通過整理若干文本結構,以具體事例說明了這一點。王明珂的重要發現之一,就是關於「根基歷史記憶」的文本結構的存在。通過「弟兄祖先文本結構」和「英雄祖先文本結構」的分析,他進一步發現在這兩種關於根基歷史記憶的亞文本結構之上,還有一個更高階的文本結構,此即「歷史心性」:「歷史心性,便是讓人們循着一定規律來思考、建構根基歷史記憶的一種文本結構。」(頁216)

中國歷史文獻中之所以有族譜、方志、傳說、神話、正史等各種不同的文類,是因為它們要分別對應不同的社會情境結構,因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本結構(頁157、258)。例如東晉常璩所撰《華陽國志》開創了地方志文類,形成了表述「『郡縣』與『帝國』間的部分與整體關係」的社會情境結構,以及「兼容並蓄地表達本地知識菁英的本土與華夏認同」的文本結構(頁248)。另外,在各種文類中常常出現模式化、結構化的敘事情節,也是為了對應一定的社會情境而形成的文本結構。「歷史心性、文類等等,皆類似布迪厄所稱的『習性』(habitus)。「習性」讓人們不知不覺地產生某種慣性行為」

《反思》指出一個「文獻」之所以可以成為「文本」,除了因為它包含着大量符號之外,同時還因為它具有與一定社會情境相對應的、暗示着該社會之結構特點的文法結構和敘事結構。

(頁133)。可以說，對文本結構的分析，無疑能夠讓我們更加容易理解人類心理，以及由此而來的各種社會行為。

五 結語：「反思」的意義

《反思》一書指出，「人類社會雖有多元變化，各種人類文化、文明雖然博大精深，但它們都有些基本共性」(頁64)。但是，能夠超越民族文化背景、從認識論的高度證明自身研究的價值，是東方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短板，甚至可以說很少有人想到這個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明珂的研究風格可謂開風氣之先。

王明珂能夠做到這一點，並不僅僅得力於他的西方留學經驗，這還與他對中國歷史和文獻的深厚修養密切相關。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審視，他看出了人類之所以發現並不斷地再生產「歷史」，就是為了將自己的本能動機演變為社會的集體意識。但是，從歷史到「歷史」的過程並非不可捉摸，而是具有一定的發展規律，可以分為一定的階段和環節。這個過程也說明，人類社會發展必然伴隨着社會記憶、偏見和「歷史」，這是人類社會無法擺脫的命運。但是社會記憶、偏見和「歷史」，並不僅僅只是思維的產物，它們既與一定的社會情境相對應，通過一定的文本結構得到表現，同時還在能動地製作、規範和強化人們的思維方式。正如《人類簡史》所指出的那樣：「多年來，人類已經編織出了一個極其複雜的

故事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像標緻公司這種虛構的故事不僅存在，而且力量強大。這種通過故事創造的東西，用學術術語來說就成為『小說』、『社會結構』或者『想像的現實』。然而，這種想像的現實並不是『謊言』。」^⑩

王明珂的「史學反思」，應該來自於對中國研究學界缺乏認識人類社會普遍發展規律意識之擔憂，「反思史學」則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將哲學的認識論具體化為中國歷史研究理論的嘗試。換言之，前者的「反思」是一個具體的行為，而後者的「反思」則是一個集合概念，來自於布迪厄的說法(頁13)。但是筆者注意到，布迪厄的“reflexivity”在日語中被譯為「再歸性」，指通過觀察某種行為而得到的主觀結論，又會反過來反饋給該行為，在其形式或性質上給予實質性的影響。也就是說，“reflexivity”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許是很難用一個名詞就可以正確描述和全面概括的。所以，日本學界在概括布迪厄認識論所提及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的這種相互為對方的基礎、相互建構對方的關係」^⑪時，有人使用「製造建構的建構」^⑫，有人使用「客觀化的重層化」，有人使用「歷史學的內省的歷史」，還有人乾脆使用「分析者的見地與分析對象者的見地」^⑬。

無疑，日本學界把“reflexivity”局限在了學術研究方法論的層次，而王明珂則明確地將這種觀察者、研究者和觀察對象、研究對象之間互為對方之基礎、相互建構對方的關係引進了認識和解釋整個人類社

王明珂的「史學反思」，應該來自於對中國研究學界缺乏認識人類社會普遍發展規律意識之擔憂，「反思史學」則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將哲學的認識論具體化為中國歷史研究理論的嘗試。

會發展規律的廣闊視野裏。也就是說，作為王明珂「反思史學」之實行基礎的“reflexivity”（反思性），其實指的就是歷史敘述和人類社會建構之間的有機的相互影響和關聯性。當我們發現歷史其實是「歷史」時，就會感到：要想發現人類社會存續衍化的規律，其實需要哲學的思辨能力。而《反思》一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價值，就是讓歷史學與哲學二者走到了一起。王明珂所提倡的「史學反思」，就是在告誡歷史研究者去反思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從歷史哲學的高度對人類社會進行觀察的意義，「史學反思」中的「反思」一詞，其實還有“rethinking”這一層含義。

王明珂的著作常給人以茅塞頓開之感，這與他善於使用具有哲學意味的集合概念有關，其中不乏他本人的創造，例如「情境」、「心性」、「表相」、「本相」等。我們期待王明珂下一部大作，如果其中能夠對上述概念進行更詳細的定義，例如區分社會表徵與社會表相、社會現實與社會本相、人類生態情境與社會情境、情境結構、外在情境、內在情境等，應該有助於其學術思想的進一步滲透，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人類思維的邏輯發展過程和社會歷史進程之間的互動關係。

由於對西方社會學、人類學和語言學思想的批判性吸收，「反思史學」中許多內容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例如「事實」(fact)和「現實」(reality)二者之不同、「習性」(habitus)、「習行」(practice)與記憶、偏見形成之關係等，然因篇幅所限，此處只能割愛了。

註釋

① 該書簡體版參見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②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84), 3.

③⑥ 山本哲士：《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の世界》，增補版（東京：三交社，2007），頁171-72；171。

④⑦⑬ 服部健：〈ブルデューにおける「分析者の見地と分析対象者の見地」〉，載ブルデュー社會學研究會編：《象徴的支配の社會學—ブルデューの認識と實踐》（東京：恒星社厚生閣，1999），頁31-35；33；31。

⑤ 池上俊一：〈物語としての歴史とブルデュー—場の歴史と歴史の全體〉，載宮島喬、石井洋二郎編：《文化の權力—反射するブルデュー》（東京：藤原書店，2003），頁289。

⑧⑭ 赫拉利 (Yuval N. Harari) 著，林俊宏譯：《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103；33。

⑨ 小須田健：〈シニフィアン/シニフィエ〉，載木田元編：《現代思想フォーカス88》（東京：新書館，2001），頁62。

⑩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北京：中華書局，2009）。

⑫ Jun Nakahara, “Essay on Reflexivity of Doing Ethnography”, 20 March 1999, www.nakahara-lab.net/phase3.html.

⑬ 森山工：〈ブルデューと人類學〉，載《文化の權力》，頁268-69。

《反思》一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價值，就是讓歷史學與哲學二者走到了一起。王明珂所提倡的「史學反思」，就是在告誡歷史研究者去反思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從歷史哲學的高度對人類社會進行觀察的意義。